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 及其对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启示

——兼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路径

张龙龙 李 升

【摘 要】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被视为新家庭史研究的核心框架。通过对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内涵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三点主要发现:第一,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具有共时性;第二,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与历史力量不断互动的时机调整过程,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深受历史时间的影响;第三,早期的历史条件和人生转型经验对后续人生转型带来累积影响。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能够为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带来启示,由此助力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研究主题上,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特定工业地区的家庭动态;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从更加细致的纵贯数据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研究团队建立两个方面展开探索。

【关键词】生命历程理论;历史视野;家庭史;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张龙龙,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李升(通讯作者),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124)。

【原文出处】《新视野》(京),2024.2.120~12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资助项目“京西矿区产业转型背景下家庭变动研究”(2022M720011);北京市朝阳区博士后科研活动A类经费资助项目“首都煤炭业转型背景下矿工家庭生活再建研究”(2022ZZ-005)。

一、问题的提出

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需要宏观的整体性把握,也需要在具体研究领域开展路径探索。纵观国内家庭研究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家庭社会学迅速发展,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家庭结构、家庭制度、代际关系、性别与婚姻、生育、养老等多个方面。然而,由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即便是“埃尔德范式”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框架也是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被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所借鉴,^[1]因此早期的研究并未更多涉及历史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家庭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中国家庭研究者们注重关注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家庭结构与观念变迁等经典命题,^[2]以及探讨土地改革、经济体制变革、城市化等社会变迁因素对家庭结构的影响。^[3]

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强调家庭是一个流动概念,^[4]主张从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视角进行研究。学界认为多样化的研究路径,能够拓宽当代中国家庭研究的边界,然而当前着力于历史发展与当下现实融通的家庭研究仍不尽理想。^[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家庭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从对国外的研究梳理来看,在历史时间和区域空间的宏观时空维度中考察家庭动态已成为一个新热点,尤其以海尔文(T. K. Hareven)为代表的新家庭史学者倡导的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框架,为该研究热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移民研究,侧重于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70年代,埃尔德(G. H. Jr. Elder)首次提出了生命历程理论分析

框架,并将该框架成功运用于其经典作品《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学界通常称埃尔德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框架为“埃尔德范式”。事实上,紧随埃尔德之后,海尔文等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将历史视角融入生命历程理论,为该理论在家庭史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新家庭史研究的发展。如果说埃尔德强调重大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海尔文等新家庭史学者则主张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把握家庭发展和个体生命历程的共时性(synchronization)问题,提出生命历程分析框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个体和家庭三个维度的时间的相互作用问题。^[6]

有学者在探讨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时,指出,“取道西方、返回中国”是一条重要路径。^[7]一些在西方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理论,虽然在非西方社会语境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为其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一点已在许多国家的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论证。例如,近年来以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分析框架来考察区域家庭动态问题,愈发受到日本学界重视。日本家庭社会学界通过一系列研究,重在引入历史与区域视角,阐明了该理论在日本家庭研究中的适用性和重要性,从而在立足于原有家庭知识的基础上推动了该理论在日本的本土化。与日本相比,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至今尚未引起中国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视,相关理论体系也滞后于实证研究。那么,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该如何理解?其对我国的家庭研究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为此,本文旨在梳理历史视野下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及内涵,通过提出该理论对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启示,尝试深入探讨在中国家庭研究领域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路径。

二、新家庭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欧美国家的主要家庭模式为传统大家庭,而工业化导致了传统家庭模式的瓦解。帕森斯(T. Parsons)指出,工业化分裂了传统的三代扩大家庭,家庭为了适应新的工业结构而不断缩小规模,从而演变为“孤立的核心家庭”。^[8]芝加哥学派及其继承者认为,伴随工业的发展,人们从农村移民至工业中心城市,原来的亲属关系网络被迫

切断,在适应工业生活的同时丧失了原有的传统文化。^[9]古德(W. Goode)虽然并不赞同这种社会解体的观点,但也强调核心家庭和工业社会的需求处于一种“合适”的关系,认为核心家庭不仅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而且劳工的安置也符合企业的需要,因此核心家庭与工业体系相吻合。^[10]这些研究重视通过传记或企业发展史来开展特定的家庭史研究。

与早期家庭史研究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在历史视角下关注庶民日常生活动态的家庭史研究被称为新家庭史研究。新家庭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可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美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是以精英的活动为中心,研究焦点在于社会公共生活。20世纪60年代在不信任国家、不信任精英的社会氛围下,以庶民为对象的新社会史研究悄然兴起。因此在此研究潮流中,新家庭史研究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第二,传统家庭价值观面临极大的挑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受到“世俗人道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尤其经过蔓延美国全域的“新左派”和“反正统文化”学生运动以及女性主义运动之后,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几近崩溃边缘。该现象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反思,将研究焦点放于美国家庭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上。第三,家庭实证研究的出现。1962年法国年鉴学派阿利埃斯(P. Aries)所著的《儿童的世纪》英文翻译版本问世,该研究让家庭史学家意识到个体及家庭的生命历程和历史时间的关系问题。1964年,以英国的拉斯雷特(P. Laslett)为代表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团队成立,该团队所从事的家庭与人口动向研究传入美国,1965年拉斯雷特的《失去的世界》出版。这些实证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为美国的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指导。第四,大规模数据的公开和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自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人员开始利用计算机技术对长达数十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加以量化分析,在资料利用和技术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家庭史研究的发展。

在前述背景下,新家庭史的兴起从开始侧重于批判帕森斯的“孤立的核心家庭”理论和古德的“核心家庭工业社会适应”理论,发展为倡导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来开展家庭史研究。例如,德莫斯(J. Demos)等学者通过介绍前工业化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家庭实例,提出了与早期家庭史研究相反的论点,即

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核心家庭已经在美国普遍存在,此后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同时,研究指出,无论工业化发生与否,围绕核心家庭的亲属关系网络一直存在,并且在互助与交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随后,海尔文倡导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进行家庭史研究,致力于推动新家庭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因此被视为新家庭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海尔文发现以往的家庭史研究侧重将家庭作为一个静态单位处理,采取横向分析法将研究对象限制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而实际上,人们在一生中往往经历扩展家庭、核心家庭等多种家庭形态,扮演不同的角色,横向分析法忽略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形态不断变化的特性。一开始伯克纳(L. K. Berkner)和海尔文尝试引入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主张将家庭史研究视为一项学科交叉领域,强调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家庭动态问题。^[12]然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局限性愈发明显,新家庭史学者们倡导以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代替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从而使新家庭史的理论框架及内涵价值更加明确。

三、历史视野下生命历程理论的确立与发展

(一) 历史视野下生命历程理论的确立

新家庭史学者之所以转向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是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存在以下缺陷。^[13]第一,家庭阶段的测量标准较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阶段主要由年龄和家庭所处的发展状态两个因素决定,年龄通常指户主或亲代的年龄,而家庭的发展状态主要通过子代的生命事件来把握。如此一来,亲代完整的生命历程得不到有效分析。第二,研究对象范围狭窄。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侧重均质的家庭发展模式而忽视家庭多样性,因此偏离一般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或个体,例如,子女较多且相互间年龄差异过大的家庭、终身未婚者等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以外。由此,埃尔德提出了生命历程分析法,海尔文与其他历史学家则首次将历史视野融入生命历程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家庭史研究中。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确立的重要标识是对“工业化与家庭”的研究。海尔文对纺织企业阿莫斯克亚格(Amoskeag)及其劳工家庭研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阿莫斯克亚格是一家于1838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成立的纺织公司。该公司于19世纪末陆续吞并当地的其他纺织工厂,并于20世

纪初发展成为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然而,在美国纺织业向重工业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该公司于1936年宣布破产,退出了历史舞台。

阿莫斯克亚格公司虽已倒闭,却完整保存了近10万份劳工个人档案。海尔文团队通过整理劳工档案中的出生、婚姻、入职、离职等记录,并结合曼彻斯特市政厅家庭登记簿、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曼彻斯特样本等信息,按时间顺序成功再现了劳工的工作经历、家庭成员及其他亲属关系网络。为了完善调查资料,自1975年起海尔文团队又对300余名原阿莫斯克亚格公司劳工进行了生活史访谈。1982年,新家庭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一个新英格兰工业社区中家庭与劳动的关系》(以下简称为《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14]问世。该著作以阿莫斯克亚格的劳工为对象,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框架详细地阐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工家庭和企业劳动的关系问题,同时提出了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的共时性以及工业时间下观察这种共时性的观点。

(二) 历史视野下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

海尔文在《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完成之际,便将问题意识转移到阿莫斯克亚格劳工子女的人生转型及其与父母的关系上。在此之前,关于20世纪美国人的的人生转型问题,学界存在两种假说:^[15]其一,在与家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个体化趋势越发明显。人们选择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而不再迁就家庭的整体利益。其二,按照特定的年龄标准,人生转型的时间节点变得更加规范。人们在特定的年龄完成上学、入职、结婚、退休等特定的生命事件,这些转变更加统一,转变时间也更加迅速。为了证明这两种假说的成立,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队列比较法被运用于探索生命历程的研究之中。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1981年海尔文团队启动的“老龄化与代际关系:队列比较”研究项目。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海尔文对原阿莫斯克亚格劳工的子女(以下称为“子女世代”)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详细的生活史访谈,以“子女世代”的访谈内容为基础,同时将其与父母队列相比较,考察了老年人生活支持网络的形成与重建方式。^[16]

在队列比较研究法的基础上,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被学者们提起,用以验证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

程理论的普适性。20世纪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开展合作,开启有关家庭与生命历程的美日比较研究,随即该合作研究团队的主要代表海尔文在日本京都西阵地区开展调研。西阵是日本丝绸传统手工制作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该地的手工艺受现代化影响正在快速凋零。自1982年至1993年,海尔文对西阵地区的丝绸织工及其亲属共计约200人进行了访谈。2002年西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京都的丝绸织工:传统工业变迁中的家庭与劳动》出版,该论著揭示了美国阿莫斯克亚格与日本西阵研究虽然在社会文化和生产系统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家庭和劳动的融合、劳工对自身技能的认知、家庭生活模式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17]

四、历史视野下生命历程理论的内涵

为明晰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有三个学术疑问需要回应:第一,从历史视角看,个体的人生转型以及不同角色的获得和丧失之间的平衡主要与哪种时间同步;第二,个体及家庭的转型如何受到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的影响;第三,从历史视角看,生命历程的早期人生转型经历对后续转型所带来的累积影响是如何变化的。^[18]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下面三个维度的生命历程理论整理尤为重要,成为构成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共时性

生命历程分析的本质是时机问题,也就是综合理解个体、家庭、社会整体以及历史的关系问题,可用个体时间、家庭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概念来分析。^[19]个体时间又称生涯时间,指个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家庭时间又被称为家庭过程,指诸如结婚、孩子出生、子女离开父母等家庭生命事件的发生,以及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变化。历史时间指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变动。历史时间通常包括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指工业化、现代化或去工业化等社会变迁,另一种类型是指经济萧条、战争、灾害等周期性的或者一次性的历史事件。^[20]前述《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中的工业时间即历史时间的一种形态,特指工业化过程。

三种时间关系的基础表现为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共时性,具体指个体的角色转变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角色转变,以及与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庭过程密

切相关。人们一生会经历多种人生转型,包括就业、结婚、为人父母、与子女分居、退休等。在遭遇社会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时,这些人生转型的时机往往取决于家庭整体的需求,而非个体的喜好或生涯计划。

(二)历史变迁对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影响

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同步进行,却又深受历史时间的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与历史力量不断互动的时机调整的过程。^[21]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在于掌握时机问题,而时机的最核心部分在于个体、家庭和历史时间的相遇时刻与相互作用。海尔文提道:“着眼于时机,是一种理解个体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以及面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时,如何排列其活动的优先顺序的方法”,主要回答的问题是,“个体和家庭是如何改变先前的生活经验以适应新环境的?或者当面对严峻的困难,几乎没有对策时,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22]如前所述,历史时间分为历史事件的特定突发和线性社会变迁两种类型。非历史学家通常将历史时间定义为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例如,埃尔德所著《大萧条的孩子们》已为学界所熟知。然而,与宏大的历史事件相比,诸如人口、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长期线性社会变迁,对个体及家庭的生命历程会带来更为直接的影响。^[23]例如,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学层面上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年龄结构和家庭角色的改变,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则对就业机会的多少以及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早晚产生影响。此外,特定时期或者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融合状况对人生转型的时间和家庭过程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早期人生转型经历对后续转型的累积影响

这一维度的研究内容重在将队列视为一个纵跨长时段历史的年龄群组,队列成员目前的社会经验不仅受当代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早期人生转型经历的影响。当然,早期的转型经历反过来也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累积影响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得以把握。第一个层面是,必须考虑早期的生命历程经历对后续发展的直接影响。该论点最早由埃尔德提出,并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得到论证。第二个层面是,海尔文主张,在埃尔德论点的基础上不应忽视早期历史条件的间

接影响,作用于早期生命历程的诸多历史条件会间接地影响后续的生命历程。

五、生命历程理论对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启示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新家庭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被视为新家庭史研究的核心框架。如图1所示,生命历程理论的三个时间分别对应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家庭动态和个人发展,其中个人发展与家庭动态密切相关,同时两者又受到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的影响。面临社会压力时,与个人相比,家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般更能做出积极能动性的回应。换言之,在新家庭史研究中,宏观的社会语境、家庭动态和个人发展并非三个单纯并列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虽然近几十年来,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历史时间、家庭时间和个体时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并未引起我国国内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视。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关键时期,探讨当前家庭问题固然是我国家庭社会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学界不应忽视对当代中国家庭史的研究。运用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家庭史,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发展逻辑,这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课题之一。本研究认为,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至少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能够为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带来启示,以此推进中国家庭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在研究主题上的启示

1.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动态考察

在研究主题上,可以运用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察特定区域的家庭动态。家庭动态被定位为“社会变迁和个体人生轨迹的媒介连接管”,^[24]是考察个体发展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时不可或缺的一环。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与历史力量不断互动的过程,因此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下考察家庭动态,超越“就家庭论家庭”的狭隘视野。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家庭动态”两个关键词加以解释。现代化概念本身涵义丰富,以重工业领域为例,在东亚脉络中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也许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其内涵。20世纪中叶以后,中、日、韩三国在工业建设初期,均在政府主导下大力发展了煤炭和钢铁产业。由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因此这一过程又被称为“压缩式现代化”。与之相比,日本的工业化进程相对缓和,被称为“半压缩式现代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加快了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工业遗产文化,这一过程被称为“去工业化”。而我国大陆地区在重工业领域的现代化既有上述共性,又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煤炭和钢铁业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相关国企通过改革逐渐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在“去产能”政策引导下,重工业领域逐步调整和优化了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此为重工业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可将其看作中国工业时间的一种类型(结合图1)。

家庭动态作为一个流动概念,其构成要素不仅包括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还包含家庭功能、角色分工等。^[25]当发生社会变动或重大历史事件时,除上述要素外,家庭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受到冲击。^[26]同时,家庭文化规范和家庭策略在回应历史力量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可以将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家庭功能、文化规范、自身技能认同等作为分析家庭动态的变量进行讨论。亲属关系不仅指狭义上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而且包括带有中国重工业劳动领域特性的姻亲关系。在工业时间中侧重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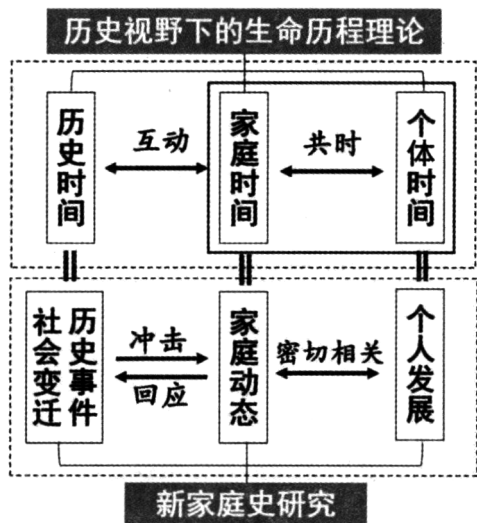


图1 新家庭史研究的核心框架图

家庭功能中的生产功能,具体包括对家庭成员的技能培训、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分配方式的调整等。通过对亲属关系和家庭功能的考察,能够明确家庭的决策过程,即家庭策略的产生。

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家庭动态的基础上,从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对当代家庭动态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各区域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其家庭经营模式也不一样,^[27]因此,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动态时,不仅可以考察个体与家庭时间等微观视角与工业时间等宏观视角的链接,还可以尝试着眼于中观层面的区域空间进行探讨。例如,我国的东北地区经历了重工业时间,而被称为“上青天”的上海、青岛、天津则上演了纺织轻工业的辉煌与衰退。在工业化发展方面,可以将特定区域的家庭动态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链接进行考察。以煤炭业的变迁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煤炭业快速发展,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东北、华北、华东等主要产煤地区都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煤矿相继政策性破产或关停,当地的家庭都在发生变化,家庭动态与工业时间不断双向互动,这些与前述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都是一致的。尤其在这其中,对于长达数十年的工业时间里,家庭动态对工业兴衰过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各时期工业化的发展对家庭动态——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家庭功能、文化规范、劳动技能认同等分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此类问题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家庭动态关系的重要研究主题。

2. 产业时间与区域空间中的劳工家庭动态考察

家庭动态与所在地区的产业与劳动密不可分,后者决定家庭的存续和繁荣。换言之,家庭动态不仅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历史时间,更受到区域空间中的产业发展状况、劳动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此,生命历程理论对劳工的家庭动态考察便更具价值。一方面,在历史时间上,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家庭动态时,一般将个体及家庭生活与历史力量相遇的时刻——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国营煤矿(国企)改革、21世纪初的政策性破产等作为家庭发生变动的主要时机点。根据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时间中,尤其是在遇到重大的历史力量时,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表现出共

时性,个体的人生转型往往取决于家庭整体需求。例如,在煤炭业遭遇政策性破产时,一部分劳工接受内部退养待遇而提前退休,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转型。然而,大量劳工在面临相关政策施行与煤矿关停时,尚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因此,他们即使已经达到内部退养年龄,仍然选择再次就业,在权衡个人与家庭利益后,决定推迟人生转型时间。此外,涉及的研究问题还包括:煤炭业转型时劳工家庭成员所处的生活阶段、劳工家庭所做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力分配方式的调整、亲属关系在克服家庭生存危机上所发挥的功能或存在的局限性、“家矿一体”的家庭文化和劳动技能认同所发生的变化,等等。

在区域空间上,我国各地区各领域的工业时间对劳工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带来相应的影响,劳工家庭为了适应工业结构转型也在不断地调整家庭策略。与此同时,区域文化也会对当地的家庭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工业时间和区域空间中考察家庭动态愈发重要。根据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早期的历史条件和人生转型经历对后续转型带来累积影响,而早期的历史条件和人生转型经历会因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无论是同一区域的工业,还是不同区域不同工业领域,在考察工业时间中的家庭动态时,根据劳工的年龄或入职时间等来设置多个队列进行比较研究更具价值。

以下结合笔者在华北、华东等矿区的调研,通过比较两组队列来分析劳工家庭动态,以及早期的历史条件与人生转型经历对后续人生转型带来的累积影响。队列一是1950年前后出生的矿工,该队列成员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经历了国营煤矿改革和政策性破产,可以将其称为“国企改革世代”。队列二是1965年前后出生的矿工,该队列成员于2010年代后期遭遇“去产能”政策下的工业结构调整,可以将其称为“去产能世代”。煤矿破产以前,“国企改革世代”生活在大型国营煤矿“单位共同体”中,家庭成员也均处于企业的家长式管理之下。个体、家庭、企业及工业时间密切相连。正因如此,社会职能过度集中于国企,而老工业基地基层政府的相关职能相对弱势。面临改革时,企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劳工支撑体系。在此历史条件下,该队列

成员遭逢煤矿关停,当时他们处于未满退休年龄,即向老年期转型前的人生阶段。加之,老工业基地因国企改革而出现下岗潮,亲属关系网络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该队列成员下岗后,最大程度地发挥核心家庭功能以“共度时艰”,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同时,他们因长期生活在家长式管理的“单位共同体”中,单位破产后便产生一种“被单位背叛”的情绪。“国企改革世代”向老年期的人生转型并不顺利,需要更多的老年生活支持网络。当然,除上述早期的历史条件外,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等先前的人生经历也对后续老年期人生转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去产能世代”同样是在向老年期转型前的人生阶段遭逢工业调整。然而,该队列成员与“国企改革世代”的生存环境大不相同。2000年以后,国有煤矿转型为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矿业集团。同时,伴随主辅分离和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改革,老矿区“单位共同体”转型为社区,基层政府职能得以强化。当“去产能”政策落地时,基层政府和企业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职工再就业支撑体系。此外,“去产能世代”早期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且通过技能资格考试及其他企业培训,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因此,该队列成员遭逢裁员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去产能世代”参加工作时已接近“单位共同体”时代尾声,该队列成员并未过多享受到国有企业的恩惠,与“国企改革世代”相比,“去产能世代”的企业文化认同与劳动技能认同相对弱化。

(二)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可以从纵贯数据的运用和研究团队的建立两个方面提供启示。在数据的收集和运用方面,首先,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等历史时间来考察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家庭动态时,需要分析大量的纵贯性数据。我国的大型追踪调查起步较晚,种类、数量及时间跨度有限,因此,在做量化分析时如何运用好全国人口普查地区样本数据十分关键。其次,根据纵贯性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研究对象开展生活史访谈。近年来,在我国以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为代表的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研究迅速发展,其中有关工人群体的生活史访谈与研究经验值得借鉴。再次,煤矿等重体力劳动型企业为确保必要的劳动力,往

往利用职工的亲属关系进行招工。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单位的职工档案保存较为完整,因此如何在遵循研究伦理的前提下,通过大量档案中记载的个人履历和亲属关系网络来重编劳工的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值得探讨。此外,有效地利用日记、书信、记事本、出工记录等纵贯性数据资料,有助于较为客观地记录个体当时的内心世界,而这部分资料的利用价值往往容易被忽略。最后,除个体自身的数据外,收集并参考中观层面的在地领域——诸如所属企业、市政、档案馆、社区、学校、医疗机构的文史资料,并将其与档案记录、生活史访谈数据相结合进行分析也十分重要。通过如此的研究方法,最终就能够将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动态和工业社会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大限度且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

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需要依赖于优质的研究团队,立足于本土实情与具体实践开展研究。在研究团队的建立方面,由于家庭动态存在地区特性,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强调劳工研究应该走向区域比较。^[28]结合前述的分析,要想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家庭动态的关系,有必要对全国各个地区加以比较分析并将其体系化,这将成为在当代中国家庭史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而如此庞大的研究计划对研究者个人或某一地区的研究团体来说实属挑战,需要各地相关研究领域的人员协同合作,形成整合性强的研究力量,将各地区的研究状况进行分类与比较,从而形成关于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与方法探索,将是今后开展当代中国家庭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进入互联网产业高度发展的时期,对此产生新就业群体等新劳工及其家庭也可尝试进行开拓性与积累性研究,这在未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同既有研究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亟须在各领域开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的探索。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各研究领域在拓展理论视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反复摸索,逐步推动重要理论知识的中国本土化过程。本文以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为例,结合中国社会语境,提出该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为中国家庭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拓展了可能路径。本文期待以此抛砖引玉,

今后能够在中国家庭研究及相关领域形成一系列理论拓展与实证研究相融汇的探索,进而助力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参考文献:

[1] 雷洁琼:《家庭社会学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2]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1930-1990年代的冀南农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3] 王跃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4] 吴小英:《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5] 杭苏红:《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家庭与性别评论》2021年第11期。

[6] T. K. Hareven, "The Life Course and Ag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 K. Hareven, K. J. Adams, eds., *Ageing and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82, p. 5.

[7] 刘亚秋:《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性路径》,《新视野》2023年第1期。

[8] T. Parsons, R. F. Bale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Glencoe: Free Press, 1955.

[9] L.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1938, pp. 1-24; R. Lint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amily", R. N.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9, pp. 30-52.

[10] W.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63, pp. 12-13.

[11] J. Demos, *A Little Commonwealth: 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 T. K. Hareven, "The Family as Proces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Family Cycl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7, no. 3, 1974, pp. 322-329.

[13] T. K. Hareven, "Cycles, Courses, and Cohorts: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Famil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2, no. 1, 1978, pp. 97-109.

[14] T. 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Work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J. Modell, et al., "Social Change and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 no. 1, 1976, pp. 7-32.

[16] T. K. Hareven, K. J. Adams, "The Generation in the Middle: Cohort Comparisons in Assistance to Aging Parents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T. K. Hareven, ed., *Aging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 over the Life Course: A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rlin: De Gruyter, 1996, pp. 272-293.

[17] T. K. Hareven, *The Silk Weavers of Kyoto: Family and Work in a Changing Traditional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8] T. K. Hareven,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Timing of Family Transitions: Their Impact on Generational Relations", R. W. Fogel, J. G. March, eds., *Ag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Famil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 143-165.

[19] T. K. Hareven, *Families,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Life-Cours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p. 128-129.

[20] 正岡寛司:《ライフコースの変化と社会的コンテクスト》,森岡清美、青井和夫编《現代日本人のライフコース》,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91年。

[21] T. K. Hareven, "The Life Course and Ag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 K. Hareven, K. J. Adams, eds., *Ageing and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6-7.

[22] T. K. Hareven,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Work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pp. 7-8.

[23] T. K. Hareven, "The Life Course and Ag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 K. Hareven, K. J. Adams, eds., *Ageing and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 8.

[24] 嶋崎尚子:《ライフコースと家族過程》,《季刊家計経済研究》1998年第40卷。

[25] 宋健等:《中国家庭的“转变”与“不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26] 李银河:《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基于兰州的调查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7] 付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8] 沈原:《劳工社会学三十年》,《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